



学人藏书
聚散录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学人藏书



聚散录

马嘶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G258.83

M164

内 容 简 介

学人与书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学人藏书的聚与散，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演变。作者根据学人藏书的目的，将他们分为学人藏书家、学者研究、文人著述和博览藏珍四类，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学人与书之间聚散相依的风流画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人藏书聚散录 / 马嘶著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0.3
ISBN 978-7-302-21814-2

I . ①学 … II . ①马 … III . ①私人藏书 - 研究 - 中国 IV . G25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2358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228 印 张：24.25 字 数：294 千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8.00 元

产品编号：033538-01

目 录

1 总论 学人藏书概说

2 一、学人与藏书

21 二、学人藏书的几种类型

23 第一编 学人藏书家型

23 一、“书坊谁不颂朱胡”：朱希祖聚书散书始末

37 二、伦明“续书楼”藏书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42 三、张元济惨淡经营的“涵芬楼”与“涉园”

藏书之兴衰

55 四、周越然的“言言斋”藏书

64 五、“书生报国”：郑振铎聚书散书沧桑

78 六、阿英藏书的几度劫难

103 七、“平生不羨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

唐弢的藏书及其归宿

112 八、黄裳的书香世界

123 第二编 学者研究型

123 一、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

131 二、王国维与书

138 三、黄侃“量守庐”藏书的聚散

145 四、“省衣节食侈收藏”：邓之诚为治学聚书藏书

150 五、李大钊身后藏书归处

159 六、陈寅恪的聚书之乐与失书之痛

170 七、黎锦熙藏书捐书记略

175 八、胡适藏书今何在

186 九、刘半农身后遗书归宿之谜

190 十、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文库”藏书

197 十一、顾颉刚聚书藏书纪实

214 十二、钱穆：聚书一生，丧书一旦

222 十三、吴文藻与冰心：找不回的“珍宝”

228 十四、王力：著作等身，藏书盈室，身后藏

书捐赠北大中文系

231 十五、魏建功万卷遗书精华入藏高校

236 十六、谢国桢的“瓜蒂庵”藏书

243 十七、赵景深的藏书、用书情怀

249 十八、王利器藏书遭遇浩劫

255 第三编 文人著述型

255 一、鲁迅藏书知多少

271 二、周作人“苦雨斋”藏书的两次劫难

- 278 三、柳亚子聚书藏书的喜忧悲欢
- 285 四、卖文买书：郁达夫聚书散书始末
- 293 五、朱自清：一生清贫却不吝于购书聚书
- 300 六、丰子恺“缘缘堂”藏书的毁失
- 303 七、俞平伯藏书毁失于“文革”
- 308 八、曹聚仁：藏书随聚随散
- 314 九、巴金的书之梦
- 323 十、施蛰存的“北山楼”藏书
- 327 十一、书人傅雷：书、人俱毁

334 第四编 博览藏珍型

- 334 一、齐如山“百舍斋”藏书的流失
- 338 二、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
- 345 三、孙犁津门聚书
- 356 四、田家英的“小莽苍苍斋”藏书

365 第五编 学人失书余览

365 一、毁失于战火者

易培基	汪辟疆	陈中凡	胡小石	仇 塚
石承熙	傅斯年	吴世昌	卢冀野	唐 钺
林尉人	耿以礼	孙本文	倪青原	王香平
欧阳春	刘平侯	寿勉成	赵建为	焦启源

郭宝钧 鲁子惠 何之泰 缪镇藩 戈宗翰
金毓黻 吴蕴瑞 梁庆椿 徐丰彦 徐益棠
王统照 胡 风

369 二、“文革”中散失者

翦伯赞 向 达 沈从文 周一良 吴 憙
蒋天枢 谭其骧 王 瑶 何满子 林 庚
章克标 周瘦鹃 唐振常 傅惜华 金性尧

374 三、无奈自散者

张岱年 谢兴尧 黄秋耘 肖 殷 孙楷第
陈 原 方汉奇

376 四、生前身后捐赠者

吕叔湘 张清常 周 扬 丁 玲 肖 三
魏绍昌 李辉英 孔罗荪 徐 迟 傅振伦

379 五、身后散佚者

沈老先生 漆 侠 梅 林 赵萝蕤 吴 强

总论 学人藏书概说

“学人”的称谓是与“知识分子”、“学者”、“文人”、“读书人”、“文化人”这些称谓相近却又不同的。

“学人”似与“文人”相近。但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算作文人，却应归入学人之列。

学人似与“文化人”相近。但一般的演艺界人士是文化人，却不算作学人，甚至一些有作品行世的作家（如工农作家、低龄写作者等）也不能算作学人。

学人似与“学者”相近。但正在大学或科研院所里读书的青年学子可以称他们为青年学人，却不能叫他们为学者。

学人似与“读书人”、“书生”、“知识分子”有着血缘关系，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书生、知识分子都够得上学人。

由此看来，学人是个内涵宽泛又很狭窄的称谓。

笔者的理解，学人是指那些从读书获得学识（多是从学校里学得专业知识，也有少数自学成才者），以传承学术文化为志，学有所成或学有专长者。如教授、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对某学科有专长者等等。那些在大学、科研院所学习，对某学科有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的学子，我们也称他们为青年学人。

“学人”的称谓是晚近时候才有的。有的论者说，“学人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同步发生的”。“中国学人本身是 20 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

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着”。（《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1日，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

“学人”既是晚近时候才有的称谓，那么，这里所讲的也是晚近时候的人和事，即近代、现代、当代的人和书之事。总体来说，是20世纪和以后的事。

学人既与文人、学者、文化人等相近，那么，本书在论及学人藏书聚散之事时，有时难免会有轩辕难分、泾渭不明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对待书的问题上确皆有难解难分之情感。

根据以上对“学人”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学人与书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一、学人与藏书

在正常情况下，学人是终生与书为伴，甚至是与书须臾不可分离的。学人要获取知识，补充知识，积累学问，就得要读书。学人要治学、教学、讲学、著书立说，就得要聚书、藏书。

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喜欢读书，视读书为乐事。过去有一首调侃以读书为苦事的学子的打油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好睡眠，秋日凄凉冬又冷，收拾书包待来年。”这样的以读书为苦的人，当然是成不了学人的。

旧时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四时读书乐》诗，相传为宋末元初的翁森所作。全诗如下：

春

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夏

修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晖。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

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谂读书趣。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

秋

昨夜前庭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

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

近床赖有短檠在，对此读书功更倍。

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

木落水尽千岩枯，迥然吾亦见真吾。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

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大概只有如诗中所咏，把读书视为平生赏心乐事的人才能成为学人。反过来说，学人应是喜读书之人。

由于喜读书，以读书为乐事，也便养成了爱书、聚书、藏书的好习惯。文学家孙犁晚年写过一篇《书箴》，这是 1974 年 4 月他在所藏《西游记》的书衣上题写的，后来人们称它为《书箴》。他写道：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

抱残守阙，以安以宁。

唯对于书，不能忘情。

我之于书，爱护备至。

污者净之，折者平之。

阅前沐手，阅后安置。

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

勿拘泥之，勿尽信之。

天道多变，有阴有晴。

登山涉水，遇雨遇风。

物有聚散，时损时增。

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学人多有购书、聚书、藏书的习惯，这成了他们共有的雅趣。有关聚书藏书的痴迷憨态，在学人的著述文字中多有所见。

如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述：

余自一九三〇年秋去北平，至三七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

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六）》中写到朱希祖购藏古书时写道：“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

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说：“我有一个坏癖气，用

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黄裳在《谈“题跋”》一文中也谈及郑振铎爱书的情况，他说：“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文章还转录了郑振铎于1937年8月24日为《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所写的跋。跋的开头写道：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

黄裳本人也是这样一位痴迷的爱书者，一位读书的藏书家。张昌华在《黄裳“童话”》一文（《人物》2002年第8期）中说：“1956年，他翻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等三部书稿，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钱一到手，全用来买书了。黄裳买书不自量力，时把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徐森玉先生曾书吕岩诗赠之，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倒真形象生动。”

以上所引几例，著名学人聚书时的执著痴迷情状可见一斑。

因此，学人大多有可观的藏书，一些著名的学人则有极富的藏书，甚至可以同那些彪炳于藏书史上的职业藏书家相媲美。

比如，民国初年的北大教授朱希祖（后为中央大学教授）的藏书有 25 万册，百余万卷。国学大师钱穆抗战前在北平的藏书有 5 万册，20 万卷。胡适于 1948 年 12 月飞离北平时，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及文件等共装了 102 只大木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 1954 年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时，他在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共装了 225 箱，约 9 万册，共包了两节火车，全部运到北京。著名学者唐弢 1959 年举家由沪迁京时，以书为主的全部家当，装了整整一个火车车皮。2000 年 3 月，唐弢的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全部书刊的登录工作，由 5 个工作人员用两台电脑，进行了两个月才登完。他捐献的藏书有 5 万多册，其中图书 3 万多册，期刊 1 万多册，建立了“唐弢文库”。巴金曾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著名文学家阿英的藏书有 10 万册左右（不包括杂志期刊和小报画片之类）。鲁迅的藏书至今保存下来的有 1.4 万余册，4000 余种。著名学者赵景深的藏书约 3 万余册。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生前藏书有 22 架，约 2.2 万册。做了 18 年毛泽东秘书、以读书收藏为乐事的田家英也有丰富的藏书，他的女儿曾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书架特别多。父亲的藏书总共有三十几书架，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妈妈的房间里，都是三面墙排满了书架，大房间里还放置两排书架，每个架子都装满了书。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林立的书架之间捉迷藏。”（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版）著名作家巴金的书是极多的，他的家里到处是书，楼上楼下，书柜书架，乃至汽车库中，都堆着书。他的书太多了，根本就没有较为准确的数量，特别是外文书，无论是数量还是版本种类，精品善本之多，在当代

中国私人收藏中，他可名列第一，光是他陆续分批地捐赠给各有关的图书馆、学校的就有图书三万多册，期刊一万多册。

当然，也有的大学者并没有多少藏书，比如，堪称一代宗师的大学者钱锺书的藏书就很少，他的书斋中只有一两个不大的书架，而且只是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友人们的赠书。而谁都知道，他是个手不释卷的大学者，仅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三部著作所援引的参考书就有万种以上，与《四库全书总目》内的数量相当，且涉及英、法、意、德、拉丁语等多个语种，涵盖了文、史、哲、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他能做到这样，一是靠他极强的记忆力；二是靠他的五麻袋读书笔记，这是他多年读书的积累。而他在核对原文时，便到他所在社科院文学所以及外文所、北大、北图去借书来核对。

钱锺书大概是个极特殊的例子。

由此看来，一些著名学人的丰富藏书，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门类之全，完全可以同一些著名藏书家相匹敌，把他们归入历代藏书家之列是顺理成章的，但我们仍然不愿把他们称作职业藏书家而称之为学人藏书家。这是因为，他们之间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唐弢先生曾把这两类藏书家叫做“读书的藏书家”和“藏书的藏书家”。窃以为，近世的学人藏书与传统的职业藏书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人藏书立足于用，即求学、治学、教学、著述时的应用。历代私人藏书家的藏书立足于收藏与传承，他们是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财富而由子孙永存。

细研之，历代私人藏书家与近世学人藏书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藏书目的的差异

中国的私家藏书起源很早，相传孔子就是第一代私人藏书

家。《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逝世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可见孔子是有藏书的。《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些记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墨子、惠施等就可以称为私人藏书家，但他们的藏书并不多。到了东汉末年，就有了蔡邕这样藏书万卷的藏书家了。《博物志》卷六记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但是，直到宋元时代，私家藏书才勃兴起来，而到了明清两代，私家藏书才洋洋大观，出现了众多的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较大贡献的私人藏书家，而且一个个蜚声海内外的藏书楼(阁)也建立起来。

中国历代的私人藏书家，最初主要是一些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们由于自己的事业所需才聚书的。到了私家藏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藏书的目的便并非是为了治学和事业所需，而是因为爱书，对聚书藏书有兴趣，或者是为了聚敛文化财富以备后代传承。还有一些是继承了上代人的藏书，继续收藏并不断增添，他们的上一代人可能是学者为治学而藏书，到了他这一代，就成了为收藏而藏书的藏书家了。

由爱书、喜读书而喜聚书成为藏书家的，如明代的“天一阁”主人范钦，清代“千元十驾”主人吴騤(为与黄丕烈“百宋一廛”相匹，故名)、“芸芸书舍”主人汪士钟、“持静斋”主人丁日昌等，皆是雅好读书而藏书的。

那些继承了前辈藏书并且保住了原来的藏书规模或丰富了藏书品种的第二、三代藏书家，虽不一定如他的前辈那样的痴迷旧籍，但只要能守住家藏没有散佚，也属于爱书者流。

对于传统的私人藏书家，过去也有人根据他们藏书的目的和状况划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清中叶学者洪亮吉在《江北诗话》卷三中把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讎家、收藏家、鉴赏家和掠贩家五类。他写道：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讎家，如卢文弨、翁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丕烈、邬镇鲍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洪亮吉对历代藏书家的分类，自有其道理，但后来也有人对他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如，叶德辉认为：考订家和校讎家应合为著述家，以刻书为事的藏书家称为校勘家。今人谢兴尧则认为：“藏书家中有的是兴趣所在，为了进行研究；有的则类于玩弄古董，流为书痴，常见藏书中许多闲章，如‘子子孙孙永宝之’之类。这些人确实是嗜书如命，希望永远保存家中，世人又目之为书愚，痴者主观爱好，愚者为书所迷。”（《堪隐斋随笔·我与书》）这亦是很有见地的概括。

而近世学人的藏书则立足于自身治学的应用、参考，他们多是依据自己的治学方向和志趣来购藏图书、文献资料（当然，他首先应是个嗜书如命者），因而他们的藏书更具专业化、学术化和实用化的特点。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献身于中国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

入门之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因此，他聚书是广搜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他在北平，五年购藏5万册书，多为四部之书。

胡适的藏书也是很多的，据在胡适家中住过好几年的史学家罗尔纲说，1930年11月，胡适全家从上海迁北平后，住在米粮库4号时，“先摆书架，客厅后过道大约摆三架，大厅把书架围成书城，胡适书房也摆三架，总共约二十架”。谈起胡适的藏书，罗尔纲写道：

许多人都问过我胡适的藏书，我说除预备写中国哲学史的书外都缺乏，他们都感到奇怪。石原皋《闲话胡适》记胡适的藏书说：“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不是事实。他预备写中国哲学史的书确是很多的，《道藏》就有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丛书都收有。但是文史的书却很缺乏了，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他做《醒世姻缘传考证》有一条很重要的证据系鲍廷博说蒲松龄是《醒世姻缘传》的著者。这条证据，他是从邓之诚《骨董琐记》看见，写信去问邓见于何书，邓回信说已记不得了。这条证据是见于《昭代丛书》癸集杨复吉的《梦阑琐笔》的，到我回广西，才从我父亲的书中找到寄给他。胡适很重视清末小说家吴沃尧的著作，他论吴沃尧的《九命奇冤》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但他却没有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和吴沃尧《李伯元传》这两篇重要传记，也是我从我父亲的书中找到寄给他的。一九三一年冬，我在广西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便是得到我父亲的书才能工作的，但到一九三四年春重来北平时，